

我国文盲人口论

陈冰 解书森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①这个论断已被发达国家提供的基本事实所证明。然而，近年来在对发展与改革的探索中，我们的许多同志往往津津于经济模式的设计，热心于轰轰烈烈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忽视了最有价值的行为——对人本身投资的研究和实践。我国与美国生产力水平相差近百年，其间固然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忽视的一大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知识的价值，未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上真正下功夫。

近几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国民教育却出现了双层逆转：

一方面，在教育的高层次上，厌学、弃学、退学倾向明显。无论在大学生中，抑或研究生中均有反映。据上海市高教部门提供的资料，1988年上半年，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纺织大学、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35所高等院校，退学人数便达396名，比上年同期翻了一番多。在研究生中，则出现了主动要求被“筛掉”的潜流。据中国人民大学反映，在对硕士生实行中期筛选制度时，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怪现象：在86级硕士生中，经考核不适宜继续学习的，全校仅有2至3名，但却有近30名学生要求被筛掉，即放弃可能获得的硕士学位，降格以求，提前结束学业，以便或出国，或经商，或及早“抢占”一个好单位，至于学业和文凭，在他们看来，则是无关紧要的。

另一方面，在教育的基础层次上，则出现了令人担心的青少年辍学现象和文盲回升倾向。据统计，近几年中，小学流失学生5000多万名，平均每年有1500多万名青、少年辍学，以至老文盲尚未扫清，新文盲又在涌现。现在，我国文盲人口已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4。在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共有文盲2.38亿人，文盲率高达31.9%。这意味着在每3个劳动适龄人口中，便有1个人目不识丁。这个比例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如苏联为0.2%、美国为0.5%、日本为1%，而且明显高于某些发展中大国，如墨西哥为17%、巴西为25.5%。^②日渐回升的文盲人口，为我国参与未来世界竞争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近两年来，海内外有识之士经常议论我国发展中的远虑（教育落后）近忧（农业薄弱）。新文盲的大量出现则构成远虑的核心，也是当前便应着力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便是讨论这一严峻的问题。

二、我国文盲人口结构

我国众多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构成明显失衡的人口文化结构。

第一，文盲人口的地区分布。

^① 转引自：Gary·S·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Published B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1964, p. 6.

^② 根据《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1987年》有关资料整理。

我国人口文化结构的畸型，首先反映在地区文盲人口分布上。无论是各大经济区之间，抑或在同一经济区内部的省与省之间，都是如此。

其一，在全国范围内，东部与西部相比，文盲人口比例相差极大。

根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①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2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6.77%。但东、西部相比，相差极为悬殊。东部某些省份，该项指标低于20%，西部一些省、自治区却比平均数高出20个左右百分点。例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该项指标分别为13.15%、17.27%和18.47%，云南、甘肃、青海却是42.89%、43.92%和51.61%，西藏则高达70.17%。这意味着，按新文盲零增长，现有文盲每年下降1.3个百分点计算，后一类省、区要达到前一类省、区现在水平，也要经过30—40年。

其二，在同一经济区内的不同省份之间，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相差甚大。

在沿海开放区，东南沿海人口文盲率明显高于东北、华北沿海。例如，辽宁、天津、河北文盲、半文盲率为13.15%、15.17%和24.89%，福建、山东、江苏则分别为32.32%、29.52%、27.62%。高位与低位相比，相差19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省际之间文盲差距更大，例如，四川、新疆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为26.17%和21.20%，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云南、甘肃、青海、西藏却分别高达42.89%、43.92%、51.61%和70.1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文盲人口的性别比例。

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在全国12岁以上人口中，男性文盲、半文盲率为15.79%，女性为38.05%，二者相差22.26个百分点。女性文盲、半文盲率高达50%上下，例如，福建为49.04%、安徽为54.05%、贵州为56.82%、云南为57.43%、甘肃为59.36%、青海为66.71%、西藏为81.1%。文盲性别比例失衡如此严重，在世界各国亦属罕见。

80年代初国际统计资料表明，^②在发达国家比例极低的文盲人口中，性别文盲比大体持平，如苏联男、女文盲率均为0.2%，日本均为1%，中等收入国家男、女文盲率存在差别，但差距不大，如墨西哥分别为13.8%和20.1%，巴西为23.7%和27.2%；大部分中、低收入国家文盲性别差距往往低于20%，例如，印度尼西亚男女文盲率相差19.8%，都低于我国文盲性别差22.26%的水平。

第三，文盲人口的城乡分布。

农村教育落后是我国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由此造成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越来越明显高于城市人口。以东部部分地区为例，据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超过30%的省份都是农业为主的省。例如，江西省为30.67%、河南省为30.90%、福建省为32.32%、安徽省为38.74%。三个直辖市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则都在20%以下，北京为13.40%、上海为14.71%、天津为15.17%。从宏观角度观察，文盲、半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如果进行中观考察，结论依然成立。以东部沿海省、市为例，江苏省文盲、半文盲为27.62%，但其农村文盲率却高达40.58%；上海平均文盲、半文盲率为14.7%，郊区县的文盲率比平均数高出8.5个百分点。显而易见，无论就全国而论，抑或每一地区内部，农村文

^① 为便于国内对比，均采用我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其指标选择的是12岁及其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例。

^② 此项资料，年龄统计范围为15岁以上文盲人口。

盲、半文盲人口都明显高于城市，二元文化结构极为突出。

第四，文盲人口的民族分布。

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极为缓慢，与汉族相比，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高，回升更明显。

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在35%以上省共7个，其中，除安徽省外，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宁夏为35.49%，贵州为40.45%，云南为42.89%，甘肃为43.92%，青海为51.61%，西藏为70.17%。从总体分析，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盲、半文盲比例明显高于汉族聚居区。

如果进行一省民族人口文化结构分析，上述结论更为明显。以青海省为例，1987年，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区，文盲、半文盲率为54.7%（男性36.34%，女性73.40%），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牧业区则为84.03%（男性为70.62%，女性为95.98%），全省平均，少数民族文盲率为74.44%，与全省汉族文盲率相比，高出40.44个百分点；与全省平均文盲率相比，高出22.83个百分点；与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68.27%相比，上升6.17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文化素质差距正出现扩大趋势。

第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

文化教育事业是经济运动的函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点应该表现得更为突出。我国近几年经济社会生活却提供了相反的实证：

其一，在国内经济发达省份，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相比，不仅未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相应提高，反而出现滞后趋势。其集中表现是，一方面，相当部分沿海省份文盲、半文盲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福建为32.32%，山东为29.52%，江苏为27.62%；另一方面，文盲、半文盲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内部也极不平衡。以浙江省为例，1987年，浙江省文盲、半文盲率为24.76%，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列第15位，省内的37个沿海开放市、县的文盲率与全省平均水平重合，如温州，其所属县文盲率竟高达42.09%，居浙江经济开放地区之首。在有文化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仅有小学程度，这种人口文化素质，显然难以持久有力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其二，在国内经济落后省、区，近年人口文化素质与过去人口文化素质相比，出现下降趋势。以青海省为例，1982年全省文盲、半文盲比例为46.81%，1987年却上升到51.6%，增加4.8个百分点。尤其令人担心的是，12—19岁青少年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该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38.41%，比1982年上升0.43个百分点，这是进入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批新文盲。

经济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核心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人们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文盲人口比例很高的国家，何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何以立足于充满知识竞争、人才竞争的未来世界？如果要谈球籍危机，要谈人的发展的话，应从这里破题。

三、我国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我国文盲率是在复杂的主、客观因素推动下居高不下的。下面，仅就观念因素、制度因素、历史因素进行考察。

首先，扭曲观念的传导效应是构成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逐步树立了有计划商品经济观念，价值规律、市场法则为我国经济生活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此同时，也应清醒意识到，价值规律尽管灵巧有

效，但终归不过是经济范畴，其覆盖面仅仅限于经济活动领域，并不是可以普照全社会的灵光。市场法则管不好、也不能管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非经济活动领域。

但是，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职能错位、观念混乱现象。其突出表现之一是，把商品观念、市场法则扩展到经济社会所有部门，要求非经济部门与经济部门一样，一无例外地要创收，追求经济效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出现了许多扭曲现象。在中、小学，一方面，掀起经商热、第三产业热，为此，不惜影响教学质量，抽调教学骨干支撑学校内部的“经济实体”；另一方面，则巧立名目，乱收费用，提高教育边际成本，加重群众负担。以安徽省歙县为例，农村中、小学入学除收取学杂费、书本费外，尚有水电费、保险费、报刊费、教育附加费、辅导费等杂捐15种之多，平均计算，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入学交费51.5元，初中三年级交费56—75元，初三历届复习生交费达百元。面对许多学校舍本（教育）逐末（创收）的非常规行为和不断增加的教育成本，许多农民不得不让学龄子女辍学，这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小学创收的一种惩罚。众多事实表明，扭曲观念的传导效应是造成学龄人口辍学，文盲、半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

其次，分配关系扭曲、社会分配不公诱发的“读书无用论”的重新蔓延，是文盲率居高不下的直接原因。

近几年，“读书无用论”死灰复燃，迅速蔓延。产生这种现象的经济原因则在于社会分配不公，脑体收入倒挂：

——在全民所有制内部，脑力劳动收入低于体力劳动收入，复杂劳动收入低于简单劳动收入，脑体倒挂明显。

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1987年，知识密集的科研、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475元，劳动密集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572元，事业单位与企业平均工资的差距，由1985年的41元扩大到1987年的97元。

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元月份调查，在16个行业中，知识密集的中、小学职工月人均收入为132.6元，大学为139.9元，均低于劳动密集的饮食、建筑、服务、采掘行业的197.0元、220.0元、220.1元和228.5元的水平。

北京市同龄知识分子及其它职工的收入情况比较则提供了倒挂程度的具体图象。以1988年元月收入为例，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职工与同年龄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职工相比，月平均收入低34元，相差21.3%。

上述资料表明，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体力劳动收入高于脑力劳动收入，简单劳动收入高于复杂劳动收入，人力资本投入和能量消耗与个人收入明显错位，脑体收入倒挂突出。

——在社会分配关系中，低文化素质的私营雇主和个体户收入畸高，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当前诱发读书无用论的另一重要因素，则是私有经济中的私营业主和个体户个人收入畸高。据天津调查，1987年，全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较上年增长11.02%，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增长10.27%，集体所有制职工下降4.66%，唯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个人收入猛增了145%。各地调查表明，私营业主和个体户基本由低文化素质人口组成。据北京市1987年调查，该市个体和私营业主总体文化层次很低，其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3%，小学毕业占17%，初中毕业占42%，高中毕业占26%，大学毕业不足2%。但正是这些低文化素质的私营业主自报月收入达979.65元，是雇工实际月收入（包括雇主向雇工提供的膳食在内）的7.1倍，是公办中、小学教师月收入的7倍，其中饮食业雇主月收入高达1007.62元，是雇

工113.3元的8.9倍,是公办中、小学教师的7.6倍。在雇主收入中,尚不包括隐性收入因素,据有关部门估计,雇主的实际收入大约在自报收入的2倍以上。

按照J·S·杜森贝利(J.S.Duesenberry)的长期消费函数理论,^①消费是具有强烈渗透性的经济社会行为,高收入者的消费对低收入者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这种效应一方面刺激人们的(消费)行为攀比;另一方面,则强化心理攀比,包括低收入者对高收入者财富增量创造手段的仿效。既然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学识渊博者只能安贫守道,文盲却可以大发其财,读书自然是无用的了。利益分配关系的扭曲直接导致两大后果,一方面,教师弃教,教育人才流失,例如,陕西省白河县中学,有20名教师不辞而别,致使正常教学大受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学生辍学,在这里,起直接作用的均源于知识与收益的倒挂。

第三,农村独户经营的手工劳动方式所具有的对科学文化的游离性,是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历史原因。

迄今为止,我国农村基本采取手工劳动方式。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对于释放郁积已久的农民劳动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世所公认的作用,但是,这种积极性终归建立在小规模生产、手工劳动基础之上,不可能上升到自觉追求文化科学知识的层次之上。由此决定,我国当前农村经济活动,无论其生产方式抑或经营方式,都基本游离于现代科学文化之外,难以对科学文化,特别是高、中层文化产生内在需求。这实际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文化知识需求间所存在的正相关关系的反映。也就是说,农业社会劳动主体不可能产生对工业社会文化的自觉需求。在封闭的生产条件下(集中表现为非规模经营),尤其如此。这是造成我国农村人口文盲率长期较高的客观原因之一。

第四,中、小学超载运行严重,基本办学条件不足,是影响学龄人口充分就读、造成文盲率居高不下的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相当部分地区存在合格教师不足、教育设施匮乏、教育资金短缺等问题。据统计,我国初中教师不合格率为64.4%(1988年),中、小学危房率10%(1985年),教育经费中光人头费便占用70%,……由此构成制约教育事业发展、影响学龄人口充分就读的外部条件。这种状况,迄今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1987年该省青田县共有657所中小学,其中261所校舍是危房,随时有倒塌危险的一级危房67所,近一万平方米。光修复危房一项,便需资金244万元。1988年该县全部教育经费预算为752万元,其中包括校舍修理费30万元,但县财政实际下达690万元,校舍修理费却到7月份仍未兑现。危房倒塌再三发生。截至6月20日,已发生校舍倒塌事件17起。在6月20日平山村小学校舍倒塌事件中,有6名学生遇难,10名重伤、5名轻伤。中、小学办学条件之差可见一斑。

除以上原因外,决策行为短期化,名义教育经费提高而实际教育经费的下降,现行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的陈旧,户籍就业制度的弊端,城乡壁垒的存在,官风、党风的不正,农村相对贫困,陈腐的传统观念影响等等,都是造成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需要分别研究。

四、文盲人口是限制农村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古代农业社会,文盲人口可以自由运用铁犁、牛耕维持农业的准简单再生产,在近代

^① 见宋承先等主编:《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工业社会，文盲尚可应付简单机器，在外延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大；在当代，文盲人口却不仅无力应付疾雷闪电般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而且难以适应由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一系列事实表明，以文盲为突出表现的低文化素质人口已经成为限制农村发展的根本因素。

首先，低文化素质是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因素。

工业社会以来人类进步所提供的事实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既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现代化建设，同样要经历这一历程。必须看到，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具有浓厚的现代文化色彩，其集中表现是，非农产业对劳动适龄人口文化结构具有严格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程度已经成为文化水平的函数，其转移程度与文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专业知识的劳动力转移程度高，文化素质差的劳动力转移程度低。

据山东省调查，大学、中专、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转移程度为58.33%、37.78%和34.22%；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转移率仅为16.65%，文盲半文盲更低，为8.44%。

湖北省人口转移资料显示同样结论：该省1986年、1987年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的占65%以上；向农村外部迁移的口中，初中以上的达75.5%；而剩余劳动力逆转（即转出农业，又转回来）口中，初中以上的只占转出人口同等文化的9.46%，初中以下的占17.16%，而文盲的这一比重高达21%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538个村的调查，1987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中，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55.5%；受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占19%。从不同文化层次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每百名劳动力中，有9.2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每百名劳动力中，有8.3人转移；小学文化程度每百名劳动力中，有4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百名劳动力中，仅有1.5人转移。

上述情况表明，要顺利推进我国由农业——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扫除文盲，提高人口文化水平是基础性工作之一。而文盲人口的大量存在，又成为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因素。

其次，低文化素质人口是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因。

文盲人口不仅限制其本身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严重影响农村中非农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人才困境所导致的诸多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职工素质差，人才缺乏，是构成乡镇企业先天不足、造血机能脆弱的主体原因。前几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大中型企业难以在市场上与其它经济实体展开竞争，在这种环境下，兼以国家对乡镇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乡镇企业一时获得迅速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面临愈益明显的来自城市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中，乡镇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落后、人员素质低下等自身弱点便明显暴露出来。据北京市统计局调查，在京郊乡镇企业职工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为30%，初中文化水平的占53.1%，中专文化水平的占16.5%，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0.45%，有一定技术水平和具有管理素质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明显低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据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在全民所有制工业、建筑业中，高中及中专文化水平的职工占32.8%，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占7.1%，小学及小学以下程度的占14.8%。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大量实证资料表明，影响现代

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素质的差异。据美国学者丹尼森测算,1929至1957年,在影响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因素中,劳动力素质提高因素占38%,土地和物质资本增量因素占15%,劳动力数量增加因素占16%。^①可见,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我国乡镇企业近几年经济效益下降,从反面近似说明了这一点。

据湖北省有关部门提供资料,1987年湖北省乡镇企业在物力、财力投入明显增加的情况下,经济效益却出现滑坡。该省当年乡、村办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分别比上年增长20.52%和32.45%,但实现的利润总额和纯利润却分别下降2.49%和3.61%;每百元固定资产创造的利润和纯利润分别比上年下降19.09%和20.02%;每百元费用创造的利润和纯利润下降23.56%和24.53%。与此同时,吸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降低。1983—1985年该省乡镇企业年均吸收100万农业劳动力,1986年只吸收21万人,1987年进一步降至10万人。

第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文化素质状况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愈益明显。

北京市对京郊1100个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劳动力文化素质与户收入水平成正比。1987年京郊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16元。按劳动者文化程度划分,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人均纯收入808元,比全市平均水平低11.8%;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均纯收入为934元,比全市平均水平高2%,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均纯收入超过千元,达到1156元,比全市水平高26.2%。

不仅如此,高文化层次的农户从集体中得到的收入也高于低文化层次的农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户,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人均399元,比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265元高50.6%;占全部纯收入的42.7%,比小学以下的农户高9.9个百分点。从集体中得到收入的差异,主要是农户在乡村企业的人数不同和取得的收入有差异形成的。据调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平均每百户在乡村企业的从业人员为39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为80人。从收入情况看,小学文化以下农户从乡村企业得到的收入人均154元,而初中以上文化的户为人均256元,比小学以下者高66.2%。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低文化素质人口的相对收入势必不断下降。这种变化尽管一时不甚明显,但作为一种趋势,却会愈益强烈地发生作用。

第四,与低文化素质相应的陈旧生育观是造成人口超计划生育的重要原因。

搞好计划生育这项国策能否落实,不仅影响近期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生态环境,而且对未来具有重大影响。人口增长,是众多因素影响下的人口再生产过程。文化程度不同,则生育观和生育行为不同,从而成为影响计划生育的重要参数之一。

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低文化素质人口计划生育观念淡薄,对生育的自觉约束力很差,往往属于多胎生育者。据调查,在28个省、市、自治区中,平均多胎率为17.96%,其中小学文化程度者占26.75%,文盲占40.19%,而大学和高中文化程度者则分别占1.23%和3.41%。文化程度对生育具有重要影响。具体关系见下表。

^① 见张一德译:《美国劳动经济学》,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0页。

文化程度对多胎生育的影响 (单位: %)

	多胎率	3胎	4胎	5胎及5胎以上
28个省、市、自治区平均	17.96	9.64	4.38	3.94
大学	1.23	0.82	0.17	0.24
高中	3.41	2.50	0.55	0.36
初中	9.15	5.69	1.95	1.51
小学	26.75	13.74	6.76	6.25
文盲	40.19	17.54	9.86	12.79

从表中数字不难看出,人口生育行为与文化程度密切相关,多胎率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文化层次越低,追求子女数量增长的意愿与行为越强烈。农村严重存在的超生人口,与农村文化不发达密切相关;这种状况,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及允许人口流动的形势下,表现更其明显。

文盲人口对农村发展所起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以上几点。但从中不难看出,文盲率居高不下,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下滑,已经成为农村摆脱愚昧落后的严重障碍。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五、降低文盲率的对策选择

要有效地降低文盲率,提高我国人口文化素质,需要进行长期持久的努力,当务之急是端正办学目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实行合理分配,为搞好教育创造基本条件。

首先,顺应现代化社会发展潮流,扭转急功近利观念,净化学校职能。

战后以来,提高人口素质、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奥秘所在。这种观念反映了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科技进步趋势。

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告诉人们,从5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生产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格局。突出表现是,在国民经济中,信息部门的贡献份额逐年扩大,信息工作者就业比重明显上升,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出现下降趋势。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信息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世界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已成为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人口素质的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在这场竞争中获胜,从根本上讲,必须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着手。

在信息时代的挑战面前,我国面临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一方面,我国必须补工业欠发达这一课,加快工业化步伐,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相差一个世纪的工业发展水平的差距;^①另一方面,则是捕捉信息经济方兴的机会,提高我国信息经济的规模与效益,防止与发达国家现存差距的扩大。^②无论是推进工业化进程,抑或追踪信息经济的发展,都要求从重物不重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切实重视人、重视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搞好人力资源开发。合理发挥教育职能,便成为题中应蕴之意。

① 对基本统计资料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以工业发展能力的基本标志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例,我国与美国相比,相差一个世纪。

② 我国信息部门与世界水平差距明显。以信息部门规模与GNP的百分比为例,进入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为40—65%,新兴工业国为25—4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而我国则在14—20%之间。

上面已经指出,近几年来,急功近利、教育拜金主义日甚一日地干扰着中、小学目标。在这种观念下,连基础教育的基本职能这一无须争论的问题也大成问题,以致我们不得不对教育的基本职能进行再认识。

毋庸置疑,基础教育的基本职能是育人,为各种人才的形成奠定基础。这意味着基础教育不具有创造当期经济效益的职能。不仅如此,从经济角度考察,基础教育部门和基础研究、医疗卫生事业及其它公益事业部门一样,实质是负效益部门,即它不仅不直接创造当期国民收入,而且需要国家或社会不断递增投入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以维持、扩大其正常运转,唯其如此,这些部门才能充分发挥其隐性的、长远经济效益,即为保持社会持久繁荣和进步提供必不可少的主体保证。从这个认识前提出发,作为基础教育载体的中、小学的唯一使命是把新的科学成果不断灌输给青少年,使之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由于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具有不同职能,所以在职能不同的部门,其价值观念、通行法则也应有根本区别。一般而论,在经济部门应树立商品观念,讲究经济效益,执行市场法则;作为非经济部门,例如中、小学,则必须摒弃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不允许市场法则插手于教学活动与教学管理之间,只能牢固树立教学第一、育人第一的净化观念,以此规范学校、社会以及政府行为。否则,如果把经济法则引入学校,把创造当期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学校好坏的参数之一,势必弱化学校的育人职能,涣散师资队伍,诱发乱收费及弃学、弃教经商等行为的发生,污染青少年灵魂,既影响教育质量,又损害教育声誉。辍学、文盲人口回升等人口素质退化现象,则是上述行为的集中或极端后果。

由此可见,要遏止文盲率居高不下的非正常状态,首先必须摒弃刺激中、小学谋取当期经济效益的观念,净化中、小学职能,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中、小学唯一目标,“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教师的唯一任务;政府应协调社会力量,搞好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材建设,对教学提供指导与服务,为教学的正常进行提供社会保证,促进中、小学切实担负起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持续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均实际拥有教育资金水平,为搞好基础教育创造必要条件。

一国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主要靠教育。在当代社会,重视教育可以兴邦,轻视教育则导致民族危亡。重视教育的集中标志并不在于名义教育经费总额的增量,而体现在人均拥有实际教育经费的多寡。只有增加教育资金的有效投入,不断提高实际人均教育资金拥有量,才会促进教育事业的繁荣。以亚洲新兴工业国为例,南朝鲜20多年来大幅度提高教育资金投入,现在教育经费已占政府开支的28.2%,无论是总量增长,抑或人均教育经费均居世界前列,这是南朝鲜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泰国同样把教育开支列作政府预算的第一位,并从1961年开始,每隔5年便制订一个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综合教育计划,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的发展,为泰国经济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面临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在社会大声疾呼重视教育的同时,整个经济却仍在数量型增长格局中运转,决策和投资都向效益高、见效快的“短、平、快”部门倾斜。在这种发展格局下,尽管近10年我国名义教育资金总量以14.7%的年均速度增长,与过去相比,增长总量令人振奋。但如果进行人均实际拥有量考察和国际教育资金供给水平比较,却会发现名义总量增长背后的巨大差距。

其一,我国名义教育经费总量增长幅度与人均实际教育经费增长相比,差距明显。众所

周知，在近几年我国名义教育经费总额有所提高的同时，物价和社会人口都在迅速增长。^①扣除这些外在变量的抵消因素，人均实际占有教育经费增长甚微，与名义教育经费总增长幅度相去甚远。由于资金短缺，学校危房依然存在，设备简陋，绝大部分学校超负荷运行。政府提出的义务教育要求与学校有效条件之间矛盾极为尖锐。

其二，与国际水平相比，教育经费占GNP比例差距明显。统计分析表明，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85年，我国该项指标为3.74%，大约相当于南朝鲜1965年的水平，既低于加拿大的7.4%（1985年）、美国的6.8%（1983年）、苏联的6.6%（1983年）、日本的5.6%（1983年），又低于世界5.8%（1985年）的水平。

上述对比表明，要改变我国教育落后现状，改善人口文化素质，亟须提高人均实际教育投资增长率，并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明确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具体要求，以此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增加实际教育投资措施，改善中小学外部条件，为提高人口素质奠定物质基础。

第三，建立合理的分配关系，扭转脑体收入倒挂现状，培育知识升值机制，创造重视人口文化素质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我国人口文化素质下滑，文盲人口回升，与知识贬值、脑体收入倒挂密切相关。显而易见，人力资本投入与个人收益倒挂、复杂劳动报酬与简单劳动收入错位的环境条件下，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自身文化素质，颇有些南辕北辙色彩。要改变轻视教育、轻视提高人口素质的颓风，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采取有效措施，明显提高知识分子相对收入水平，培育知识升值机制。

人们还记得，本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初，美国的教育事业曾一度停滞，进入80年代之后，针对教育基础的削弱、中学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全国教育质量委员会推动了一场遍及美国的广泛的讨论。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中学质量下降导源于师资质量不高，师资质量不高则源于激励机制太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政府决定除去严格教师的选拔、招聘和加强在职训练外，主要通过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优化教师队伍，包括对乐于任教的大学生给予优惠贷款、提高教师工资水平和设立优秀教师奖等等。这些措施对于改变教育滑坡、提高中学教育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80年代中期，苏联也采取措施，提高教师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包括：第一，把9月1日定为“知识节”，在全社会形成弘扬知识、尊崇人才的风尚；第二，在每年预算中增加35亿卢布，用以大幅度提高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工资水平（提高率为30—35%）。这些措施收效也很显著。

我国要遏止人口素质下降，其关键同样是启动利益分配杠杆，矫正扭曲的分配关系，培育知识升值机制，创造重视人口文化素质的社会环境。为此，应该从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分配体制、分配机制，尽快结束事业单位与企业分配制度的双轨制。

事实表明，社会普遍忧虑的脑体收入倒挂、知识严重贬值现状并非偶然失误造成的，而

^① 据统计，1979至1987年，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连年上涨，1979—1986年，平均递增率为4.6%；其中，1983—1986年，年均收入达7.1%，1987年，上升8.8%。与此同时，人口以每年1500万以上的数量净增。1987年，净增人口为1700万，入学儿童以同样规模增长。

^②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是事业单位与企业现行分配体制、分配制度、分配机制双轨制的产物。要改变这种难以为继的分配格局，靠零打碎敲式的局部性调整是难以根本奏效的，只有从有利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和其它劳动者积极性、有利于促进我国科学、教育、卫生、文化和其它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目的出发，改革事业单位过于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和事业、机关不分的工资制度，结束工资制度上的双轨制，建立符合知识劳动特点、有利于实现劳动支出与报酬对称的工资模式。

知识劳动部门工资模式应具有下述基本特点：首先，要符合社会管理和分类管理的要求，变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分类、分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变单一的计划分配机制为计划指导下的社会调节机制，对社会经济职能不同、工资来源不同的部门和单位，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从体制上培育合理调节脑体收入关系的功能；其次，适应对现行结构工资进行改革的要求，建立既符合知识劳动特点，又具有改变平均主义和排劣功能的职务（称）等级工资制，从制度上为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提供保障；第三，适应价格变动要求，实行部分工资与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挂钩措施，借助自动机制实现精神劳动保值。

新工资模式能否有效的关键，则在于是否具有自动增值机制。这种自动增值机制应该具有一个参照系、两个联动环节。所谓一个参照系，是指知识劳动部门各类人员的工资水平应与企业同类人员相对照，通过与后者持平或稍高于后者，实现人力资源的均衡配置。所谓两个环节，一是指同一职务（称）内不同等级之间的晋升由自然机制制约，工作人员只要胜任本职工作，经过一段时间，便可自然晋升一级工资；二是指不同职务（称）的晋升则应经过严格考核，借助竞争机制来进行，经考核合格者才能晋升职务（称）、增加工资。在上述机制下，知识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工资变动既与企业人员工资变动相关，又与本人所在单位发展变化相关，更直接取决于本人职务与资历的变化，通过脑力劳动者工资的自动调节而与体力劳动者保持合理关系，从而形成知识增值机制。

新工资模式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当前，则应通过提高知识分子工资标准、晋职升级、建立物价补偿制度和津贴制度等办法来提高知识分子工资水平；与此同时，还应建立有效的宏观调节体系，搞好宏观调节，克服腐败现象，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某些部门的消费基金失控等问题，使分配关系向合理化方向转变，为恢复知识价值创造条件。

此外，调整现行教育结构、改革教育内容，使学校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重视乡镇企业技术改造，提高其技术有机构成，使农村经济产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自觉需求；有效控制人口盲目增长，有区别地逐步解除人口迁移管制政策，允许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强化教育法制观念，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扭转性别歧视陋习，为男、女青少年提供同等的升学、求职、晋升机会等等，都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质、防止文盲率上升的有效手段。

作者工作单位：陈冰 国家统计局
解书森 国家人事部

责任编辑：张力之